

在回忆里，友情才会显得那样美好，是时间为友情磨出了包浆

虎年立春过去一个多月，忽然铺天盖地了一场大雪。冒着大雪去天坛，衬着飘飞白雪，红墙碧瓦的天坛，一定分外漂亮。没有想到英雄所见略同，和我想法一样的人那么多。想想，如今手机流行，拍照方便，人人都成了摄影家，趋之若鹜来天坛拍雪景



心如冰清(国画) 张思燕

的人，自然便多。我坐在双环亭走廊的长椅上，这里平常人不多，今天，也多了起来，都是在雪中拍照。坐在双环亭里的人，几乎是如我一样的老头儿老太太，看年轻人纷纷在大雪中嬉戏，手机和相机像手中的宠物一样，在雪花中一闪一闪地跳跃。

坐在我身边的，也是一个老头儿。我来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，大概时间久，有点儿寂寞孤单，便和我说话找话聊了起来，方知道他比我小两届，68年老高的一的，当年和我一样，看年轻人纷纷在大雪中嬉戏，手机和相机像手中的宠物一样，在雪花中一闪一闪地跳跃。

越聊话越密。他很爱说话，话如长长的流水，流个没完。听明白了，他是来参加他们队上知青聚会的，同班的七个同学说好了，今天来天坛双环亭这儿聚会，拍拍照，聊聊天，到中午，去天坛东门的东晓居吃饭。当初，他们七个同学坐同一趟绿皮车厢的火车，到北大荒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，别着回到北京后工作不一样，

包浆的友情

肖复兴

有人当了小官，有人发了点小财，有人早早地下了岗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七个人的友情，一直保存至今，从1967年到北大荒算起，时间不短。

都快中午了，除了他，那六位一个人还没来。他显得有些沮丧，拍拍书包对我说：北大荒酒我都带来了，准备中午喝呢。咱们军川农场出的北大荒酒，你知道，最地道……

我劝他：雪下得太大了！也是，没想到今儿雪下得这么大，你歇歇我们定的日子，没着黄历！他对我自嘲地苦笑，又对我说，好几个哥们儿住得远，今天这路上肯定堵车。

我忙点头说：那是！别着急，再等等。大伙儿都好多年没见了，本来说是前两年就聚聚的，谁想这疫情一闹就闹了两年多，聚会一拖再拖，到了今天，又赶上这么大的雪！

这样的聚会，更有意义！我宽慰他。这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同学打来的，告诉他来不了。放下电话，他对我说：他家住得最远，

清华那边五道口呢！又来了个电话，另一个同学打来的，嗓门儿挺大，我都听见了，也来不了，家里人拉他非要到颐和园拍雪景，人正在去颐和园的路上堵着呢。

少了不少！他冲我说，显然有点不甘心，拿手机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，铃声半天，没有人接。他有些扫兴，又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，这一回接通了，抱歉说来不了，实在没辙呀，这么大的雪，咱们改个日子吧！

他放下电话，不再打了。坐了一会儿，突然，他站起来对我说：这么大的雪，我本来也不想来。我老伴说，这么大的雪，再滑个跟头儿，摔断了腿……可我一想，今天这日子是我定的，天坛地方也是我定的呀！

叹了口气，他又对我说：你说那时候咱们北大荒的雪下得有多大呀，比这时候大多了吧？那年冬天，一个哥们儿被推举上工农兵大学，给这哥们儿送行，在农场场部，包下了小饭馆，下这么大的雪，跑十几里地，不也是都去了吗？

我劝他：此一时彼一时了，兄弟，那时候，咱们多大岁数，现在

又多大岁数了？是！是！他连连称是。说着，他看看手表，站起身来，看样子不想再等了。

不再等等了？他冲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背着书包走出了双环亭。

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白茫茫的大雪中，心里有些感慨，知青的身份认同，只在曾经同在北大荒的日子里；知青之间的友情美好，只在回忆中。毕竟老了，几十年的岁月无情，各自的命运轨迹已经大不相同，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，与北大荒年轻时更是大不相同。如果还能有友情存在，在五十年时光的磨洗中，也会如桌椅的漆皮一样，即便没有磕碰，也容易脱落。热衷于聚会的知青，沉溺于友情的知青，是那么的可爱可敬，只是，如此细怀和钟情的纯粹友情，和如今纯粹的爱情一样，已经变得极其稀少。能如古人王子猷雪夜访友，只能是前朝旧梦。

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欲望的纯粹友情，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。在回忆里，友情才会显得那样美好，是时间为友情磨出了包浆。

这棵树有别于另一棵普通的树的那一部分，便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吧

打开折叠的松山湖

陈崇正

我是松山湖的老居民，十多年前在湖边教过的学生，如今多数已经为人父母；而这些年轻松山湖日新月异，湖边人来了又走，最终我也加入这入人往之中，从既是过客也是主人，到与这片土地若即若离，所幸却从未真正离开过。

若说沧桑，毕竟还是有的，时间总会在心底悄然增加岁月的厚度。湖还是那片湖，开阔而明亮，对不同心境的人敞开。忘记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习惯性地希望有更多人认识松山湖，虽然松山湖早已足够知名也足够繁忙，特别到了节假日，路边常常是车满为患。

但这是不够的。如果仅仅是游人如织，依然是不够的。我曾经在松山湖边见过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教授，他此行的目的是去跟一家韩国航运公司谈技术转让业务，顺道来中国旅行。我知道丹麦的人口还没有东莞多，但科技力量非常强大，仅凭哥本哈根学派的盛名便足以让这个城市享誉世界。面对我的恭维，教授摇摇头说，他有许多外国朋友，他们来到哥本哈根的第一站，是向我打听安徒生，然后去安徒生墓地献上鲜花。

“从某个意义上说，人们通常是通过安徒生知道丹麦，其次才是乐高和饼干。”他笑着说。聊天中，他赞美了松山湖的风景，然后问我，苏东坡有没有来过松山湖。我一边惊讶于他竟然知道苏东坡，一边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只能告诉他苏东坡喜欢荔枝，而松山湖种满了荔枝树。

与丹麦教授的交谈，让我第一次为没有故事的松山湖感到局促，第一次感到一个地方仅仅有风景和科技是不够的，它还必需有文化，有人文，有故事。但其实这不是一个新话题，每个城市的管理者都明白，必需有文化名片，必需打造文化的软实力。关键在于，“打造”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奋力而为的生硬，而对文化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培育，是培育这个与地方相适配相融合的文化生态。

有一年，我应邀参加青海一个诗歌活动，在金银滩参加建设足够让它变得美丽动人；我常常想起2005年我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时的满眼荒凉。然而更应该看到，松山湖在文化上依然是被折叠着的，并未被很好地打开。或者可以说，从文化意义上理解，松山湖的文化建设才刚刚开始，要用百年的尺度去看待文化的开发和培育，要看到这座科技之城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从文化属性来看，松山湖的文化当然不能像千百年古都那样从故纸堆里去翻找，也不是移植几个明星大咖发声歌唱便能够立竿见影粉刷一新。要看到松山湖能有今天的成绩单实属来之不易，必须从它内在的文化肌理入手去培育可以源源不断输出的种源。要从更高的维度上阐释松山湖，书写松山湖。

某一天当涓涓细流汇成大湖，阳光照耀的一瞬，某个陌生心灵便因此受到感召，从而打开被折叠的心湖。

尼采说：“人对自己了解到什么程度，他对世界也就了解到什么程度。”

你了解自己吗？

刘荒田(美国)

哪怕你坐七望八而脑筋一点儿也不糊涂，能写洋洋万言的救世宏论，可敢回答一个问题：了解自己吗？

不可能一点也不了解；但是，透彻吗？可预测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走向吗？姑且拿下一个例子作检测：最近喜欢得不行的一件东西，或一个人，或一本书，或一处风景，或一种游戏，“喜欢”可延续多久，何时兴趣递减，何时掉转头不顾？我承认，无时无刻不与之周旋的“我”，亲密无间之“我”，我依然看不透，难以完全把握。

我常常被“习惯”钳制。一些极细微的内心反应，使我感觉这一偏差。在家里，有许多年，都是老婆替我盛饭、舀汤，我坐在扶手椅上当大爷，没感觉有什么不对。直到一天，她不理我空下来的碗。我一惊，什么不对呢？生气了？抗议了？心里冒起极微妙的“耿耿”。加以检讨，遂为自己的岂有此理吃惊。

推想下去，一位素来豪爽的朋友，每次上茶楼和咖啡馆，埋单非他莫属，谁去抢都自讨没趣。久了，单子放在桌上，所有朋友都不碰，看他呢，许多年过去，现代礼貌君突然不请客了，要AA制，众老友表面唯唯，背后骂他，哼，翻脸不认人。当他在他世时，我也没写过关于他的文字。父亲过世两年后，我重新执笔开始写作，并写过几篇关于他的文字。然而，这一切他更不知道了。我未能成为父亲的骄傲。但我想，如若在天有灵，父亲会为我出书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其实，也正是父亲离去后情感郁积让我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笔，才有了这本祭祭的《夜谈如水》。所以，这本书应该让父亲看到。在这本书的日记中，我写下了如下文字——

岑桑老啊，您从来是说话算数的，可这回您食言了

无法兑现的约定

宋晓琪

广州少有地一连冷了20多天。2月26日有些暖了，久违的阳光活泼泼地在窗外的桂花叶上跳跃。岑桑老，您在这天离去，从此我们的虎年之约再无兑现的可能……

正月十二的上午，您打来电话，在我印象中，您一共也没给我打过几个电话，虽然相识已经快30年了。您在电话中总是叫我“晓琪同志”，别人这么喊，我会觉得时光倒流，一定是生分或初次见面，您不同，您是这些年唯一这么称呼我的，是习惯也是郑重，我固执地这么认为（平时聊天岑桑老是我“晓琪”的）。

那天您在看似随意中非常郑重地说：“晓琪同志，我要去住院……”我的一紧，正想问是什么原因，您不给我留时间，中气很足地继续说：“下星期出院我就马上约你，你得上我家里一趟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可不是一趟哦。”我得去很多次，和您聊，采访您。”我的心一松，看来是例行检查、保养几天。

“你到我家是开车去还是坐车呀？”

“您放心，我开车，而且很近啊，我不是去过好多次了吗？”

“对，我记得您是开车的。那就好，我不开车，也没去过你那儿……”

我赶紧抢了一句：“怎么能让您跑呢，我去很方便的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，我一出院就给你电话。”

放下手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有一丝担忧，我知道您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，又已经95岁高龄，但另一个声音说：肯定没事的，您精神旺，走路快，胃口好，说话响，谈兴高，每次我们去喝茶，您都饶有兴味，讲起往事绘声绘色。在我看来，您除了耳朵有点背，其他啥事没有，活100岁没问题！我好期待您早些出院，给您写传记的事断断续续说了好几年，这回总算是敲定了。

10天后，也就是2月22日，

我还没有接到您出院的电话，心里开始不安，微信询问陈俊年，陈局说，岑桑老好多了，你直接给他电话吧！

电话打过去，您接了，声音有些虚弱，耳朵更不好使了，我只得报上姓名后赶紧说：“您好，好好休息，等您出院，我就去您家。”这回您听清楚了，连说了两声：“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”我的不安加剧了，但还是相信，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顶多再住几天医院，恢复的时间长一点，采访的日期推迟些。无论如何我想不到，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您通话！

大约是2016年吧，我们几个文友一起看望您，不记得是谁提起您应该写个传记，您没有马上答应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您的老部下孙吴远指着我说：“叫宋晓琪写呗，她肯定行。”您似乎一点不意外，笑眯眯看着我，我赶紧表态：“您同意的话，我没有意见。”

您点点头：“好，有机会的。”后来见到您，我不问，您也未提。直到2019年，我们和您、田姨（岑桑老夫人）喝茶，您对我说：“我的老家顺德想写我的传记，等定下了我就推荐你去写。”

“好的，到时候您通知我。”

转眼就到了2022年的元月底，陈俊年给我发来几张照片，是他们几个老同事头天去看望您拍下的，接着陈局长又与我通电话，告诉我和您谈起写传记的事，提到了我等您给消息，您表示：如果晓琪同志愿意，我们就找个时间聊聊。陈局还转达了您的话：“宋晓琪的文字很好，传记可以由她来写。”

我听了心里涌起暖流。立即想起1994年第一次去您家时的情景。当时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即将出版，有位朋友知道后怂恿我找您写序，我确实有点吃惊。

直到朋友再三说您平易近人，提携文学后辈，不妨一试，我才拎着书稿，惴惴不安地去见您。结果竟然受到不少鼓励，这才有了您那篇题为《一副真诚而亲切的文字》的序言……

往事历历在目，除夕那天我随即与您短息联系，大年初一我们又通了话，您因为听力不大好，嘱咐我把邮箱发您，更方便交流。您收到邮箱后几乎是立刻发出邮件——

晓琪同志：早安！我有没有弄错你的邮箱？请复，我会随即给你去信。

岑桑 2月1日晨

我平时很少查邮箱，您一连发了三次我都没有复，您有些着急，叫您的孙女给我电话，让我查收。待我确认之后，您又发一邮件——

晓琪同志：很高兴与你联系上了。知你还有兴趣给我写传。我想让我们先见面谈谈，我把可以用于参考的文字材料给你过目。你阅后如认为可以，下了决心，那便动手吧！好吗？

岑桑 2月1日

当天下午，我怀着敬意给您回了信。第二天一早，您回复了——

晓琪同志：早上好！您的回信带给我一个十分愉快的早晨。谢谢！尤其感谢您对我的褒奖，真是受之有愧。很乐意陪您到故乡走走，很近，不用一个钟头的车程。可以看看我的“书屋”，跟我的乡亲、我的儿孙辈聊聊。节后随时恭候。祝您好！

岑桑 2月2日晨

几天来，我不敢回看您发给我的邮件，此刻鼓起勇气打开，顷刻泪目……岑桑老啊，您从来是说话算数的，可这回您食言了。您说“节后随时恭候”，可我去哪儿找您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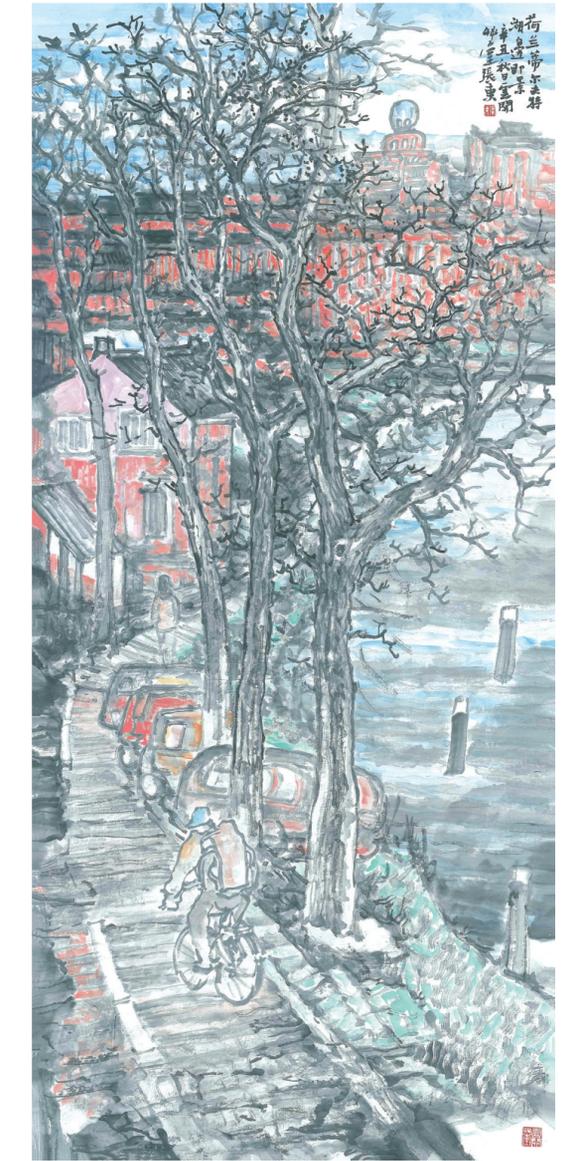
交往淡如水，师恩重如山。岑桑老啊，天上人间，我和您的虎年之约永无兑现的机会了……

给父亲烧一本我的书

方绍山

在电话没有普及的年代，只能写信，可以想见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捉笔的不易。这次回家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当年收到我的信，由父亲读着，一字不识的母亲在旁听着，时常听得泪涟涟。后来有了电话、手机，在拨打但不频繁的电话里，与父亲的交谈也简洁无趣，但我能感受到千里之外电话那端的喜悦。

没有十全十美，父亲也不例外。他经历的单调和视野的局限，让我对其行事及言语不免有怨怼之处。后来，在他逝县城求学，当满月成月的分离后回到家，我觉察到父亲很想多说话，但彼此心知的那份客气劲，让交谈有丝丝陌生和别扭。大学毕业，我南下广州谋得教



荷兰蒂尔夫特湖边即景(纸本设色) 张德

即日起至3月15日，“南京北宋，东海西海——张东画荷兰山水作品展”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羊城创意产业园内)举办。

在心里，我无数次默念我想重新说的话，但想说的话只能是一场内心彩排，而演出终再无机会

除夕，是万家团圆的日子。按老家习俗，这一天要给故去的亲人上坟（老家俗称“送亮”）。这一次在给父亲“送亮”时，我给父亲祭烧了一本自己的书。

那天下午，从家里走去荒野里父亲的寄身之处。踏过曲折狭窄的田间泥路，日渐荒废的堰塘，经冬的田野萧索极了，偶尔有觅食的鸟儿在田间急速掠过。我走过，一生劳动的父亲曾无数次走过。走在这短短的一段路上，我回想父亲在四季里忙碌疾走的身影，似乎走过他浓缩的一生。回到父亲的坟前，点亮香烛，燃放烟花，我将撕下的书页点燃。看着一页一页的书页灰飞烟灭，我与父亲默默交流——其实，父亲在世时，我们的交流有限。我时

常想，如果将我们父子间曾经的全部对话连缀成文，其篇幅在彼此重合的人生书页中确乎只有薄薄数页，以致可以忽略。但也正因为交流有限，有些话语才弥久难忘。

年少时，或许是由于维护长辈的威严，抑或是因为生活艰辛而致心气不顺，父亲对我近于冷漠，严厉得近乎苛刻。那时，与父亲的交流一直是单向的，我极不愿与其主动交流，多只是被动应答，连不得已而唤出的那声“爸爸”都是怯怯的。及至高中，我到县城求学，当满月成月的分离后回到家，我觉察到父亲很想多说话，但彼此心知的这份客气劲，让交谈有丝丝陌生和别扭。大学毕业，我南下广州谋得教

终再无机会。我从来羞于别人叫我作家。我只是一个养肤浅陋的文字书写者。当不惑之年后才提起笔，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写作训练的最佳时机，也不期望成名成家。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沧桑。而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将如一粒尘埃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，无人记取，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扪心自问，对自己父辈和祖先的过去，我们了解多少？我们似乎天然地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忽略藏于生活褶皱的细枝末节。

其实，也正是父亲离去后情感郁积让我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笔，才有了这本祭祭的《夜谈如水》。所以，这本书应该让父亲看到。在这本书的日记中，我写下了如下文字——